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二期 ——
(二〇〇五年三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3a)

【当事者说】“陈里宁事件”始末	王广宇
【往事追忆】精神病？政治犯？	陶德坚
【牢狱生涯】杨先生在难中	李 辉
【史海钩沉】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温 相
【史料辨析】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余汝信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陈里宁事件”始末

• 王广宇 •

(王广宇：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得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一、“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查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年1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

遗症。

二、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见本刊zk0205c所载“陈里宁案材料”——编者），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要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陈里宁到社会上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的5、6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6、7月。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六、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夭，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 原载《往事》

附《往事》编者按：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痴人说梦。故事中的主角陈里宁经历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刘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全过程。“陈里宁事件”的参与者也大多经历了“革命——反革命”的过程。

当疯人陈里宁从疯人院里出来，他可能感觉像进了一所更大的疯人院，外面的人显然比里边的人更疯狂，更不可理喻。当我们回想起那些场景，天安门前上百万人的歇斯底里、红八月的打砸抢、批斗会、早请示晚汇报、声嘶力竭的“表忠心”，抹着红脸蛋儿的“忠字舞”、“语录操”、真刀真枪的“文攻武卫”……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所大规模的疯人院。相比之下，在整个“狂人事件”中，显得最不疯的也许就是这个陈里宁——因为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和周围的世界茫然不知所措。你把一个生活在正常环境里的人空降到文革时期的中国，他也会是这种反应——而他身边的人的行为则更像是疯子。

可笑的是连疯人院也造反了（改名叫红卫医院）；可笑的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意旨的王力、

戚本禹，居然到疯人院去挖掘反刘资源，结果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捞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弄得拿不起也放不下；然后还有医院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他们围绕陈里宁结成誓不两立的两派，医院里两派的争论是——陈里宁是反刘英雄还是精神病，而社会上造反派的争论是——陈里宁是反刘英雄还是反革命。而这些争论正好反映了当时的两种做法，一种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毕竟历史上孙膑、宋江之流都曾装疯卖傻蒙混过关，后来反攻倒算，掀起了大浪），有点儿“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意思；一种是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精神病，这样做颇有点儿粗暴和玩世不恭，但也有以现有体制整合离心因素的意味。

说大伙儿是真疯有点冤枉。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下面，掩盖着很具体的个人动机：权力和利益。树立陈里宁就树立了自己，打倒陈里宁也会打倒自己，反之亦然。所以陈里宁就成了必争之“地”。

说陈里宁疯是有根据的。但是他再怎么疯，也顶多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或者恩格斯，认为自己比刘少奇高明。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认为自己是上帝和人民大救星的人要正常多了。而且他的不幸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

但有些人疯却是全人类的不幸，比如希特勒、斯大林等人，这些自以为是上帝和救世主的人发起疯来，世界就遭殃了。

“陈里宁事件”看上去很荒诞——超出了那些荒诞剧作家最荒诞的想象——但实际上是有其社会心理根源的。在有些精神病医生眼里，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就是说每个正常的人都不同程度的有点疯，要不然那些“克里斯马”领袖就无从出现，文化大革命也无从产生。

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根源是体制上的。当国家权力体制吞并了社会，取消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制衡，最高的权力就膨胀为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会产生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这一幻觉就是疯狂的开始。在专制主义所谓全能体制的作用下，疯狂很容易传染给全体民众，最后，绝对的权力才发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这是所有“克里斯马”领袖面临的结局。大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小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的“陈里宁事件”都是如此。

“陈里宁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陈里宁事件”。

~~~~~

## 【往事追忆】

精神病？政治犯？

• 陶德坚 •

（陶德坚：原清华大学教员，文革中任群众组织领袖，后移居加拿大。本文摘自她的遗作《风雨人生》，原载“五柳村”网站。——编者）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

出院后又回到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出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

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后来就被秘密逮捕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应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冈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冈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冈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有二、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



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广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广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广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么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办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么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12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议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铨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40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广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广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广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各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拥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侯虞铨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冈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广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  
【牢狱生涯】

杨先生在难中

• 李 辉 •

—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底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严厉的冲击。戴乃迭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小屋里叹息。文化却已远去。共同翻译的乐趣与满足，在这样的时代简直是一种奢侈。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习惯，早就在风暴突起的那一时刻起被搅乱，除了两人之间偶尔的对答之外，不再有当年的激情和陶醉。生命在无谓地消耗；精神在扭曲中被蹂躏；一切文化的积累和创造都被打入冷宫。这不足为奇。同时代的许许多多文化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无奈地活着。第二天就应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是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十、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旋即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于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一小半，戴乃迭先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

十一点多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来了，是办公厅一个年轻人，他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要我揭发《中国文学》的一个编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一走进来，就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大概还是这件事情吧，就连皮鞋也没换，穿着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就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里面黑黑的，只有一个台灯开着。一屋子人，黑压压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那一年，杨宪益五十岁。

我说完后，他们脸变了，把我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戴上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有一大堆人，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之类的话，大概以此做为搜查的依据吧。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问我还有什么事。我当时惟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只穿了一双拖鞋，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他们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按下

我的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是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二

和戴乃迭相比，杨宪益的狱中生活丰富得多。回忆往事时，他会生动地叙述一件件狱中见闻，那神态，就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冒险。

虽然罪名相同，但杨宪益是中国人，就没有戴乃迭同样的优待。不过，这样也好，他不会感到寂寞，何况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他也多了接触社会的机会。性情中，他时常爱以一种“好玩”“有趣”的心情面对一切，在这里同样如此。随遇而安，对于他来说，恐怕是身陷囹圄之后让自己的精神依然坚强的最好选择。在这里，他不必想起牛津校园的美丽，不必念念不忘与戴乃迭相对畅饮的快乐时刻，他需要的是让自己沉静下来，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承受打击。他有一种自信，这自信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强权的蔑视。

被捕的第一夜是与酒相伴度过的：

我先被带到一个房间，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被去掉，把皮带、鞋带也拿掉。我穿的拖鞋，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没有皮带裤子总是要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还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郁风和黄苗子也在这里关押过，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了望台。我被带到楼上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关得人已经挤不下了。本来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这样房间里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平时一个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却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还是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天已经很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关灯睡觉的，而我快十二点才给抓进去，就只好挤在那儿睡觉。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可惜呀！我们在这儿都三、四年了，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三天之后，提审开始。

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端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代。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

从审问中杨宪益得知，他住的这间牢房，前不久关押过遇罗克。审问官用遇罗克因“死不悔改”而被枪毙的案例教育他。

狱方交给杨宪益纸笔，要求他在三天内写出交代。他便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一块玩的事情写出来。这样的交代狱方看了之后当然极不满意，拍桌子恐吓，要求他再写，把所有认识的，杨宪益认为有问题的人都写出来，外国人在内。杨宪益依然如故：

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说的都是好话，我就一个人一个人这么说，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不再审问了。

不再提审，更没有审判，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要在监狱里坐下去。坐多久，无法得知，就像为什么入狱也无从知道一样。

三

监狱就是一个小社会。对杨宪益这种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那些小偷小摸、抢劫犯等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磨练。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言谈举止，在他的面前呈现出一个与以往所接触的完全不同的群体。不过，他并不感到别扭，相反，在他们中间他感到踏实。他们对他这个年长者，一个并不像知识分子的人，没有坏感，更没有距离。杨宪益真正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杨宪益的知识和学问，在这个小社会居然派上了用场。

在同屋里面，杨宪益是读书人，他便被任命为学习组长。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每天早晨的学习内容是读“毛主席语录”，背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杨宪益回忆，在他们中间，他的“老三篇”背得最熟。就安排他负责领着别人读，检查别人背诵。每天早上当《人民日报》送来之后，也是由他负责念给大家听。

狱中一些人与事令杨宪益无法忘记。

有一个老头，一读报纸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时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因为我们是牢人管牢人嘛。他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当时，每个犯人都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手还挺巧，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个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还有一个事，大家一起说菜名。譬如说冰糖肘子怎么好吃。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外面监视的解放军过一阵子就要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页就被抄走了。

自得其乐也许是当时支撑杨宪益和狱友们的唯一方式。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一旁听那些

年轻的狱友讲各自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它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他便偷偷教唱英国歌曲。歌的内容总是与喝酒有关。酒和英语，这两种过去曾经与他朝夕相伴的东西，此刻在这种环境中以这一方式又伴随着他。

有时他还给大家背唐诗。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读过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杨宪益缓缓地吟诵着。次数多了，有的人也跟着念，学着背。这也差一点儿惹起麻烦。一个犯人向狱方揭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是恨共产党。这样的举报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造成恶果。相反，由于杨宪益在狱友中间人缘极好，大家知道了他被举报的事情后，那位举报者立即受到唾弃和嘲弄，甚至有人要揍他。这就难怪，二十多年过后，每当谈到狱中生活，杨宪益总是对那些难友们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谈起往事，杨宪益时常会讲一些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狱中生活同样如此。他说，在狱中四年，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读报琢磨出林彪出问题了。

我们关在监狱里，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摔死的事情。我最得意的事是根据报纸琢磨着他有事了。

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的名字不见了，接着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过去每年一般都是林彪出来用沙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一九七一年这一年没有了。毛主席的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的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琢磨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

大概有三四天，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他看我的一本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就摆到一边，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结果，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怎么就不没收？我没有说什么，笑笑，只说：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人，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把狱中的事当作得意来回忆，这是杨宪益的特别之处。其实，当时他心中远不会如此轻松。他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杨宪益却无缘相见。有牢友偶尔喊上一句：嗨，瞧，还关着几个外国女人！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涯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继被释放回家。

先行释放的是杨宪益。出狱之前，杨宪益有过一场虚惊。

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像。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是说：收拾东西，跟我们出去。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一个人四年的关押，就被这样的几句话打发。然而毕竟是杨宪益所期望的结局。他签完字，走出监狱大门，外文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接他。身无分文，接他的人递给他几十元作为零花钱。

走进家门，家里一切仍是四年前模样，只是四处积满了灰尘，空寂的房间也成了耗子的乐园。书柜、衣柜里全是耗子窝。用杨宪益的话说，一群耗子见到他都不高兴，一下子全跑了。他再看看衣服，不少衣服上面都是洞，根本不能穿。它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居住了四年，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没有人浇过水，但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又见到那瓶酒——被捕时未喝完的那瓶酒。它依旧在茶几上，动也未动。杨宪益拿起来反复端详。被捕时走得匆忙，瓶盖未盖紧，剩下的半瓶酒颜色业已变黄了，不能再喝。也难以下咽这瓶酒，四年伤心酒。

提前释放杨宪益回家，是希望他能在戴乃迭回家之前把家里好好收拾一下。戴乃迭毕竟是英国人，这样，当她释放回家时，家里略为整洁一点儿，这样以免她目睹窘状而过于难过。杨宪益用了三二天的时间，把屋子擦乾淨，整理好，大部份破破烂烂的东西都扔掉。外文局的人还告诉他，戴乃迭要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他一一照办。他盼望着戴乃迭的归来。

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回家了。

杨宪益果然按照领导吩咐准备好了蛋糕、巧克力和酒。

戴乃迭走进家门。

新生活重新开始。

□ 原载《万象》


~~~~~  
【史海钩沉】

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 温 相 •

1) 军委碰头会。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北京）召开由各军区、各大兵种、解放军三总部以及有关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参加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主要研究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问题。

叶剑英作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反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军队中的推广，他强调指出：“军队不能和地方一样，要区别对待，军队要是搞了四大就是等于放羊，现在，国际局势不明朗，万一，有了战争，军队一时集中不起来，出了问题，谁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都支持他的意见。

突然，叶群站起来指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说：“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叶群的话引起轩然大波，叶剑英马上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叶剑英、徐向前等都站起来跟随喊口号。萧华也喊，叶群马上制止：“萧华没资格。”陈伯达接着讲了话：“萧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张春桥、姚文元也马上对萧华做了狠狠的批判，谢富治和康生意外的没有发言。这时候，江青终于说话了。

她说：“萧华，你很狂妄！你是不是毛主席的兵？我看你不是！你是资产阶级的近卫军！你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到了中南海，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真是狗胆包天！我是准备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在军队的代表作战到底的！”

接着，江青说：“我提议，由向前同志主持总政工作，徐帅是老革命了，主席多次说，徐向前坚持红军不打红军，建国的時候，谁的山头最大？毛主席说是徐帅的山头最大，可是，向前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很谨慎，很好。我建议。”徐向前立刻表态说要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再定。叶剑英站起来说：既然会议有了新动向，我准备先回去学习一下。向徐向前请假。会议过程中，萧华作为被批判者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以上部分讲话摘自《中央党史档案汇编——中央军委1967.1.19会议纪要》）

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萧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徐向前发出指示：会议记录不准带回家。交给军委办公厅保密局保管。然而，谢富治把记录立刻交给女儿谢静宜，使很多造反派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也把会议内容不慎泄露。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在萧华景山东街的住处，萧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

（2）大闹京西。

次日（1．20）军委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萧华一进房间，江青质问他：“你去哪里了？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萧华不说话。徐向前很恼火，就大声对萧华说：“你就说，有什么？他们能把你吃了？江青同志是文革的旗手，她问你为何不回答呢？我和叶帅都在，谁敢动你？你要把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拿出来嘛！”萧华还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张春桥说：“萧华，你是胆小鬼嘛，你还能革命吗？”

此时，叶剑英说：“萧华昨天晚上到了我那里，如有窝藏之罪，我叶某担当！”江青不说话了。接着讨论军队开展文革的事情，忽然，叶剑英问陈伯达：“阎红彦死了，怎么回事？”（阎红彦是1955年授予的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1．8自杀。）陈伯达说：“不清楚，可能是自绝于革命和人民。”叶剑英说：“什么是可能？阎红彦是总理担保的，红小鬼出身，他能有什么错？”江青接过话来，说：“总理担保的人多了，谁能保证都是好人啊，死了就死了，阎王请他喝烧酒！”叶剑英闻听大怒，拍案而起，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茶几上的几个茶杯就是被叶帅拍碎的。江青大惊。叶剑英厉声说到：“军队不能乱，长城不能毁！”徐向前接着说：“谁敢毁我长城？”

会后，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检查（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陈伯达恐惧不堪，随后，就让秘书给军委办公厅送去他的条子，说那天说的萧华是绅士的话，是吃完安眠药以后说的，不算数。江青向毛泽东汇报，叶群向林彪汇报，林彪向毛泽东请示：叶剑英是不是想搞什么事情？毛泽东批示：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一共十六个字。

1月22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毛泽东亲自招呼叶剑英到跟前来，笑呵呵的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都发过了？我早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话说到当面，问题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叶剑英也道了歉。接着，毛泽东指出：军队要抓战备，不能乱等。

1月24日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去林彪住处，把起草的军委七条命令，请林彪过目，林彪表态支持，聂荣臻还和林彪开玩笑说：“军队都乱了，你这个国防部长还不是光杆司令？”林彪也破天荒的开了玩笑说就是就是，国防部就成了空穴了。还说：“萧华的事情还是主席定夺，我们都要听主席的。”

1月28日，毛泽东亲笔增加一条命令，随后以军委名义发出。2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八条命令。

~~~~~

【史料辨析】

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 余汝信 •

谢静宜当然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惟这种近似于当代宫帷秘史类的传闻每隔数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见温相“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对丁某人的评论的解答”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中共自身披露的公开信息的混乱。

如1992年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下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

典》，谢静宜简历如下：

“谢静宜（1939—）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清理。”（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367）。

谢富治是湖北黄安人，该书的谢静宜简历条目又紧跟在谢富治的简历后头，使人产生联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温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这一错误信息的受害人？但简历称谢静宜“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未免离谱了点。

到1994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内收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两篇文章，书后，附有其简历：

“谢静宜：女，1935年12月出生，河南人，1952年参加革命，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主席机要员，现为退休干部。”（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页535）。

此简历虽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贯资料自然值得信赖。谢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1953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793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同上书，页265）。

2001年中，还是那位沈学明，再次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其中谢静宜的简历修订如下：

“谢静宜（1935—）：河南商丘人，女。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760—761）。

本来，《从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两书出来后，谢静宜的出生日期、籍贯及早年经历应已清楚，显然，此“小谢”与那“老谢”家并无任何瓜葛。

根据公开资料，谢富治倒是有一女儿谢小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就读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高干子弟最佳去处就是哈军工一类的国防尖端科技院校，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层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滕叙尧：《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页1918）。

“潜规则”是现今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中共党内其中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中

央机要部门不使用任何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是一条铁律。这样，高干子弟有可能去上类似谢静宜就读的机要学校吗？试想一下，在中央机要要害部门安插使用高干子弟，该有多少弊端！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将随时可能接触到的、有涉其父辈利益关系的机密外泄？试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农子弟，道理其实也就很显浅——毛怎能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党内僚属的耳目？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高层谁也不会干此等傻事。其实，光是这么一条“潜规则”，就足以将温相们驳倒。

温相文中所谓周恩来说话的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演义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实的文革史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次会议过程中批萧华，消息的外泄者是与会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可参见舒云：《百战将星——杨勇》，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页272—274），与郑维山没有关系（杨勇随后的被打倒倒与郑有些关系），与温相指名道姓的谢富治、谢静宜更没有丝毫干系。即便假设如温相所虚构两谢是一家人吧，这“小谢”是机要干部出身，是毛泽东的译电员，“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是机要干部的最基本守则，这么一个会都要外传消息给什么造反派，他毛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谢家与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凭什么要落井下石，把会议消息告诉外人？还有什么“军委办公厅保密局”。军委办公厅与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隶属总参编制序列，本身并无下属机构，而总参只有“机要局”，可没有什么“保密局”。

本来以为温相先生不过是假货的受害人，这一来，反倒令人怀疑他是假货的贩卖者、批发商了。不过，编故事还得会编，如京夫子、师东兵等就编得似模似样，温相编的却很整脚，怎么也说不圆那故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温相还偏偏爱把编的故事说成不是故事而是严肃的正史，把喜剧、闹剧说成是正剧，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三国志》，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历史小说”说成是严肃史学著作。

当然，谢静宜自己的简历也有一些问题，如称其“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这就公然侮辱了曾经经历文革的千百万人的集体记忆。

据一般的说法，谢静宜1968年就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也重复了这一说法，但似乎这种说法并未能得到有力的证实。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1969年3月24日上午，中央警卫团81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京大学（此前，组成北大军、工宣队的军队成员全为63军的人）。同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警卫团、工宣队、63军共十三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中央警卫团参加领导小组的是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五人。（《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679）

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为主任，谢静宜为常委之一。1971年5月24日，北大重新成立校党委，杨德中为书记，谢静宜亦为党委常委之一。（同上书，页684、704）

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谢静宜1968—1970年间在清华军宣队、革委会任职的情况。清华1969年1月25日成立校革委会，主任张荣温（兼），1970年重新成立校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兼），1972年1月，迟群任清华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81）。

虽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以谢静宜一个普通的机要译电员身份（虽则是毛的机要员）和相当中专毕业（谢其实在机要学校也只读了一年）的学历，同时担任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最

高学府的高层领导，那也是文革时期才能出现的“新生事物”。

1971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后召开的四届一次全会上，谢静宜“当选”市委常委。1973年5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谢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45）。

今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105—106）。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以上罗列了谢静宜这么多横跨北大、清华、北京市及团中央（筹备组）的职务（还几乎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是就此说明，她在1969年以后并不是“从事机要工作”，至于她当时利用这些职务到底干了些什么，相信经历过文革的千百万人们都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多费笔墨。

1976年10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对谢静宜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77年7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谢静宜从北京市委除名。同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指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页344、353、357）。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关于谢静宜被开除党籍一事与上书说法有异：“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82年11月17日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见该书页345）。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现了在谢静宜身上发生的信息混乱。谢的组织关系到底在那里？她是否可能被开除两次党籍？哪一种说法更为可靠？看来是有待有心人进一步予以考证了。

但无论如何，温相先生所谓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从犯主要身份认证”（见温相“关于对丁凯文一文《历史岂可任意胡编乱造》的解答”，“浴火凤凰”网站·凤凰论坛·莫谈国事，2004—6—28），却是无中生有之物。证伪其实十分简单，首先，只有“江青反革命集团主、从犯”，而没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四人帮从犯”这样不“规范”的说法，此外，既然是“认证”，怎么会是“之女（又作侄女）”的？天下那有这样模棱两可的“认证”？然而更重要的是，谢静宜被捕后关押于公安部所属的秦城监狱，其案件的审理，权属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简称“两案审理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亦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无管辖权。

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

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值得一看。该书提及：

“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

“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

诚然，谢静宜后来未如迟群般被判刑，原因正如汪文风先生所透露，是欲以其作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汪文风还说：

“……在谢静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方面，有上当受骗的一面。

“当然，谢静宜也不是完全上当受骗的问题。她所以陷得那么深，还有其本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机要员，却处心积虑地往上爬。正因为紧跟江青一伙，才爬上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的地位。她在参与江青搞的许多活动中，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凶残，以便沿着江青递给她的梯子往上爬。

“对谢静宜这样的审查对象，我们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免于起诉，不给判刑，这体现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时关于‘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要重在挽救的方针。这样做，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意义深。对于谢静宜本人来说，也给她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一次机会。对于国内外，也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敢于放宽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胆略、说到做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这样做是有深远意义的。”（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160—165）。

对谢静宜是否应判刑，几经激烈争辩，后由两案审理小组的老人们最终拍板议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谢静宜免于起诉”。

免于起诉，并不等于没有犯罪。谢静宜的历史，有极不光彩的一面。然而，去年12月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香港“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说不尽的毛泽东”，谢静宜作为正面人物，多次出现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大谈特谈当年在毛身边的“幸福”，仿佛历史上完全没有十年文革这么一回事，这就令人非常恶心！因为一涉及毛与这位“小谢”的关系，一段颠倒黑白的话语总使我们记忆犹新：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86）。

“凤凰卫视”一贯以正义的裁判者自居，东征西讨，动辄指责某人“忘记历史”，宣判某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凤凰卫视”自己此番对谢静宜的偏爱，难道不也正是极大地伤害了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国人的感情？！（2004年7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